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应奇 刘训练◎主编



# 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

## Mill on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英] 约翰·密尔◎著  
胡勇◎译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应奇 刘训练◎主编

# 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

## Mill on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英] 约翰·密尔◎著  
胡勇◎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刘训练  
责任编辑：王莹  
封面设计：郑迪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 / (英)密尔 (Mill, J.S.) 著;  
胡勇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9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书名原文: John Stuart Mill on Democracy and Social-  
ism

ISBN 978-7-80762-898-9

I. 密… II. ①密…②胡… III. ①密尔, J.S.—民  
主—政治思想—文集②密尔, J.S.—社会主义—政治思  
想—文集 IV. D082-53 D09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3385 号

书名：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  
著者：约翰·密尔  
译者：胡勇  
出版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50mm × 960mm 1/16  
印张：22.75  
版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次：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发行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ISBN 978-7-80762-898-9  
定价：3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 从“西化”到“化西”

——写在“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之前

应 奇

城邦之外，非神即兽。

——亚里士多德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

按照汉娜·阿伦特在《人类状况》中的叙事，自由主义现代性是通过颠倒古代世界的公私区分而崛起于近代世界的。在古典希腊时代，存在着与城邦和家庭的区分相对应的公和私之间的尖锐区分。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当人们在他们的同侪之前展现自己，并试图达致荣耀时，他们就是在从事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但是，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一个前提是公民已经成为所谓生活必然性的主人，而对后者的支配则属于一个前政治的领域，亦即家庭的领域或私的领域。随着现代社会领域的出现，紧接着积极生活对于沉思生活的优先性的倒转的是行动、工作和劳动之间的古典等级被颠覆，并先被工作的心智，最终被劳动的心智所扭曲。于是希腊人视为人类活动的最低形式在现时代喧宾夺主，而真正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自由的领域反而湮没不彰了。

无论阿伦特对古典希腊城邦的描述存在着怎样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成分,但她这种通过行动、工作和劳动,公与私,以及政治与社会的区分对于现代社会病理的诊断及其解救之道的寻求确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并具有虽未必是一脉相承但却是有踪可寻的效果历史。

首先,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哈贝马斯曾坦承阿伦特是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思想家之一。在对公共领域及其规范基础即交往行动理论的探索上,哈贝马斯都受到了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及其对行动、工作和劳动的区分的影响。但是,与阿伦特悲叹公共空间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衰落不同,哈贝马斯注意到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形式在启蒙时代的出现和形成。与阿伦特把她的公共空间理论与她对表象这个空间中的行动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模糊了公共空间概念在民主的合法性理论中的关键性地位不同,哈贝马斯通过对阿伦特概念的全面转换,使得重新确立公共领域与民主的合法性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其次,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剑桥共和史学的宗师波考克把阿伦特对于公与私的区分和以赛亚·伯林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结合在一起,作为他的基本的概念座架,一方面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自我理解,重构了公民人文主义的历史谱系,强调公民人文主义的两个维度即以德性为中心的共和主义模式和作为自由主义现代性之前身的以法律为中心的范式是继续并行地得到发展的;另一方面以风俗作为整合公民人文主义和商业人文主义的中介,从而以德性、权利和风俗的三重奏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史模式,一幅迥异于自由主义范式和以古典共和主义面貌出现的前自由主义范式的崭新的政治思想史画面。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几度兴衰但仍然余韵不绝的美国对公共哲学的探求中辨认出阿伦特的思想建构和历史叙事的凝重面影。其名肇端于李普曼的美国公共哲学一方面与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和塔尔蒙以及德国战后的极权主义批判相呼应,首先关注的是自由民主在20世纪的沉沦式微以及极权主义的悚然崛起——而李

普曼视之为现代民主在非常时期无力阻滞极权主义之一大原因的屈从于大众压力的公共舆论虽不能与阿伦特所谓“恶的平庸”完全相提并论，但却也不无可比性。另一方面则开启和预示了后来在历史学界、法政学界、社会学界甚至哲学界蔚为大观的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广泛诠释和深入解读——而阿伦特并未自外于这一大潮，《论革命》中对于美法革命的瑰丽的富有想象力的对比则更是与以贝林和伍德为代表的革命史学范式，以阿克曼、米歇尔曼和森斯坦为代表的共和法学范式，以克里斯托尔、诺瓦克和贝拉为代表的公民宗教范式呈相互呼应之势，甚至对后来者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例如目前似已接过美国公共哲学探求之旗帜的桑德尔则干脆直接以新阿伦特主义相标榜。

桑德尔诚然难说有多大的理论建树，但我们不要忘记，被视为深刻地刻画了美国民族和文明的气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经过杜威对公共性的探索和米德对自我的社会构成的揭示后，已经充分地彰显出其激进民主的政治意涵。哈贝马斯更是视之为继青年黑格尔左翼之后对于民主问题的最有创造力的回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哈贝马斯的重构，实用主义已经从一种用传统欧洲的和我们的眼光看有些“粗俗”的“地方性”哲学“升格”和“蜕变”成了一种相当“精致”的“普世”哲学，并成为哈贝马斯和他的同侪们为之鼓与呼的“反思现代性”的构成性要素，而恰恰是这种“反思现代性”的观念为最终证成具有规范性内涵和普遍主义指向的“多元现代性”诉求奠定了基本的视域。

分别沿着历时和共时或纵向和横向的标轴分化和展开、调整和互动的公私二元区分对于我们观察中国近世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同样是一个既极具启示，而又有相当限制的概念架构。一方面，从清末民初的“私德”、“公德”之辩，“中国人自由多少”之争，经20世纪中期的“政道与治道”之辩，“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传统主义卫道”之争，到晚近对中华现代性和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探索和寻求，都可以在看出上述架构或明或暗、或浅表或深层地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的总体性和

复杂性又使得无论传统中国的体用模式还是现代西方的公私之辨都愈益显得捉襟见肘、不敷使用。

从西方自身的语境来看,阿伦特所描摹的现代社会领域的兴起对于古典的公私之辨的含义无疑是双重的。一方面当然是公私之间的古典区分被彻底模糊,例如出现了像“福利国家”这样在阿伦特看来“自相矛盾”的现代建制;另一方面,真正现代的私域概念又与古典的公私区分毫无关联,非复此种区分所能牢笼,例如卢梭的“私密”(private/intimacy)概念和密尔的“个性”(individuality)概念这种只有在基督教为西方世界永久性地贡献了“意志自由”之后才能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古代的异教世界所完全陌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尚未发展出既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古代智慧,又具最强烈的现实相关性的概念框架之前,不管一种概念框架对现状的诊断是多么入木三分,如果它是与既有的架构完全对立的,那么不但它的建设性将大成问题,而且它的破坏性将使它严重错失对于理解现时代至关重要的东西。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对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的改造和重构正是趁这一概念间隙而起,而对于公共领域的双重性——经验的维度和规范的维度——的强调则使得这种对于公共性的探究可以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一样被理解为广义的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救赎的内在组成部分。

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核心论述形成的背景来看,西方从“二战”结束前后到60年代初,从极权主义批判到意识形态终结这一阶段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板结化不能不说对前者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核心论述虽然把握住了康德哲学这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之根(“西方的”新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亦认为正是康德为自由主义奠定了道德基础),却仍然受制于战后西方“买椟还珠”、“壮士断臂”般的自我反省的浅表性,从而重新落入了“中体西用论”的旧径。例如,在作为“制度层”的“社会性实有”与作为“观念层”的“文化秩序”的关系问题上,用来支持新外王论以便“开出”民主与科学的“两重存有论”仍然不免有

抽象地并置理想与现实的简单化之嫌。而这主要还是由于此种论述一方面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儒学出路”问题，而非更广泛的“哲学危机及出路问题”（劳思光先生语）；另一方面则汲汲于“化西”（牟宗三先生语），“不是把儒家思想视为修正西方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性，而是当做西方主流的超越；不是为儒者在现代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而是在儒学体系中给现代性划定位置；不是转向某种较为朴实的、致力调和的努力，而是贯彻总体超越西方哲学的策略”。德人雷奥福（Olf Lehmann）于是把这种“力图将儒家的立场从讨论中的一方转变为整个讨论的框架”的“已成惯例的因应策略”称之为“此种道德形而上学思路在其纲领上的过度要求。”

正如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祛魅恰恰反过来为马克思主义解咒，并为后者重新恢复和焕发活力提供了契机，20世纪晚期在反思现代性前提下出现的实际上具有规范性内涵和普遍主义取向的多元现代性观念也为我们透视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从这个视角回望中国近代自西学东渐以来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心性）的变革历程，以及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的论辩逻辑，都莫不提示我们公共哲学和政治思想之属对于当代中国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在这里，公共哲学和政治思想所对应的作为人类之“共法”的正式建制的框架和公共讨论的平台既非只是上述三步曲中的一步，也非体用模式中的单纯的“用”（如在“中体西用”论者那里）或单纯的“体”（如在“西体中用”论者那里）。在这里，所谓“制度”不再是可以与它所生长和植入其中的文化秩序中完全分离开来从而外在地“移植”的，也不是可以通过对传统的更具“独白”色彩的重新阐释从而内在地“开出”的。在这里，重要的是一种理性反思和对话原则所主导的集体学习过程：我们的“对话者”不但包括“他人”，也同样包括“前人”；我们所“反思”的不但有“前人”的世界，更有“他人”的世界，因为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他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的问题——离开了“他人”，甚至都已经没有办法来界定“我



们”。在这里，始终重要的当然还有阿伦特所谓“自我开启”和“自我创造”，但是“开启”必其来有自，“创造”更非无中生有；“开启”是在“这里”“开启”，“创造”是在“这里”“创造”：

“这里”就是蔷薇，就在“这里”跳吧；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于普林斯顿大学 Friend Center

2008年1月

## 作者与译者简介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亦译穆勒),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学体系》(1843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论自由》(1859年)、《代议制政府》(1861年)、《功利主义》(1863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以及《自传》(1875年)等。

**胡勇**, 河南舞阳人, 现任教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著有《一种中道自由主义: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等。

# 目 录

第一章 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	1
第二章 文明——时代的征兆(1836)·····	52
第三章 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	82
第四章 劳动的权利(1845)·····	137
第五章 为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声辩(1849)·····	167
第六章 思考议会改革(1859)·····	223
第七章 集权(1862)·····	254
第八章 社会主义残章(1879)·····	294
一、序言·····	294
二、导言·····	295
三、社会主义对当代社会秩序的反反对·····	301
四、分析社会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秩序的反反对·····	320
五、社会主义的困难·····	330
六、关于非僵化而多样性的私有财产权思想·····	345
译后记·····	350

# 第一章 德·托克维尔的 《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sup>〔1〕</sup> (1835)

德·托克维尔先生<sup>〔2〕</sup>在其大作的开端写道：“在合众国逗留期间所吸引我的新颖事务中，没有什么比普遍的身份平等(equality

---

〔1〕 选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选集》第18卷第47—90页(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ed. J. M.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1991, volume XVIII)。该文首载于《伦敦评论》第一期(1835年10月)，第85—129页(《威斯敏斯特评论》第30期)。作者所依据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版本是：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Par Alexis de Tocqueville. Paris: Gosselin, 1835; Democracy in America, By Alexis de Tocqueville, Translated by Henry Reeve,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35。以下的行文中，两种版本分别缩写为Tocqueville和Reeve。本文出现在密尔的《论证与讨论》第一版(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I, 1st ed.)；部分内容被放入《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收入《论证与讨论》第二版(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II, 2nd, ed.)。编者的部分注释涉及不同版本行文、措辞及语法的变化，对理解作品关系不大，被译者删去。——译者

〔2〕 在以下的摘录中，我将尽可能地使用里夫先生的译本。但是，为了让内容更易领悟，或比里夫先生的译本更接近原作的精神，我们有权利自由地变换这种要求，即使是以牺牲文体的典雅为代价。——作者

of conditions)更打动我。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这个首要的事实对整个社会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它给予公共舆论特定的方向,给予法律某种特色;它传授给执政者新的箴言,传授给被治者特殊的习惯。我很快就发现,这个事实的影响延伸到了政治特征与国家法律之外,它对私人生活的控制绝不亚于对政府的控制;它塑造言论,激发情感,提出一般的生活习惯,并且修正非它所产生的一切。

随着我对美国研究的进展,我愈发感到,身份平等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其他一切似乎都来源于它。它作为中心原点,我的所有观察常常在这里结束。然后,当我把思路转向我们自己的半球时,我认为,我也发现了某些东西,类似于新世界提供给我的场景。我观察到,身份平等,尽管不像在合众国一样到达了它的极限,但每天都在向此推进;而且,统治美国社会的民主,好像很快会在欧洲攫取权力。从此时起,我就获得了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理念。<sup>[1]</sup>

因此,合众国的制度,对于创作这些章节的兼具原创思想与渊博学识的作者而言,仅仅是次要的目标。所谓次要,仅指这些制度自身对于他的主要目标不可或缺。我们这样说既是确切的,也是公正的。这个目标就是,研究美国的范例彰显了民主的什么问题,研究他认为的我们时代的伟大且重要的问题。

将美国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材料,德·托克维尔先生并非独一无二。这种常识几乎不值得一提。站在争端任何一方的所有人在写作与谈论时都会马上把美国拿来为己所用。但是,就其一般目的而言,他们和德·托克维尔先生相当不同。

美国通常被分裂欧洲的两大派别所引用,作为支持民主或者反对民主的论据。民主分子试图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成为民主分子;贵族分子则以此努力证明,我们应该坚守贵族制度,抵制民主精神。

---

[1] Reeve, Vol. I, pp. xiii—xiv; Tocqueville, I, pp. 3—4.

德·托克维尔先生把他的美国研究成果呈献给欧洲世界,并非试图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他认为,该问题已经被确定无疑地解决了。

大批英国公共政治家与公共作家生活在实际上不了解欧洲重大思想运动的氛围中。他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即使在他们最深远的思考中迄今也很少能够达成的结论,却是先进的大陆思想家们进行思考的出发点。他们也会惊讶地发现,一位哲学家,他在贵族制与民主制之间所保持的公正性在我们时代无与伦比,这位哲学家认为:民主的进展,根据没有必要加以强调的证据,并且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既不能够也不应该被阻挡。德·托克维尔先生思考的内容是,不要判断民主是否会来到,而是当它到来时如何充分地利用它。

现在,对于构成我们种族历史的系列变革的全面考察,每一个自嘲对哲学有所造诣的大陆思想家都不陌生。这种考察给予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启示是:通向民主的运动来自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拂晓,并且从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在稳步前行。8世纪以前,社会被划分为贵族与农奴:贵族拥有一切,农奴一无所有。在随后的每个时代,这种身份的不平等都在逐渐地削弱。每个世纪都为此做出了可观的工作,以拉低有权者,抬高底层者。文明的每一进步,理智的每一胜利,和财富的每一增长,都在加倍地增加多数人的资源。而同样的原因,通过其间接作用,分割和削弱了少数人的能量。我们现在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状态同我们得以走出的那种社会状态相比,可以称之为平等。而且,不仅同样的均质化影响依然在运作,而且这种影响的力量由于世人前所未睹的新因素的加入而被大幅度强化。头一遭,阅读的能力与习惯开始渗入一直充满惰性的民众中。阅读是力量,不仅因为它带来了知识,而且更因为它是一种沟通手段。因为,借助于它,不仅观念与情感扩散到群众中,而且每一拥有观念与情感的个体知道自己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继续得到支持,单是它就有足够力量使自己跃居优势地位。头一遭,多数人现在接受了这样的教谕(这种教谕一旦被

接受就决不会被忘记):他们的力量,如果决定加以使用,将是无可匹敌。头一遭,他们懂得了为了自己的目标团结起来,而不是坐等贵族中的某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首领。为了共同目的而进行合作的能力,以前是由上层阶级所掌握的垄断性权力手段,现在成为最下层阶级的最可怕的工具。毫不奇怪,由于这些影响,同最近的一个世纪或以前的三四个世纪相比,在十年内,社会将会更大步地走向不平等的均质化。

德·托克维尔先生想象不出来,一种进步,这么多世纪以来一直不停地稳步前进,现在可以被阻止。他认为,这种进步会继续下去,直到所有人认为的不平等从人类中消失。仅有一些残留的不平等,作为保护财产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后果,才能够被保留下来。在他看来,这种进步是一种神秘的事实,包藏着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可能的恶,但是也孕育着巨大的可能的善。事实上,剩下的仅仅是民主与专制两者择其一。他深信,除非其中一种能够实行,否则另一种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作者在沉思人类正在迈入的全新形势时,考虑到他们对于这种新形势的紧迫性无动于衷,就充满了忧郁与焦虑之情。我们提请英国读者注意他的导论中的一段较长的非常有趣的文句,它可以作为对正在进展中的重大变革进行思考的一种范例,这种变革对于许多英国读者而言是崭新的:

在我看来,在我们时代的基督教国家中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裹挟这些国家前行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能够被阻止,但它还不是快得不能加以引导。它们的命运还在自己手中,但稍一迟疑,就不会是这样了。

当前,指导我们事务的人所肩负的首要责任是教育民主(educate the democracy)。如有可能,重新激活它的宗教信仰;纯化它的道德;控制它的能量;以治世之学取代经验的匮乏,并且以对它的真实利益的认识取代它的盲目本能;使它的政府适应时间与地点,并且根据环境与人物而修正它。

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政治科学(new science of poli-

tics)。而这是我们很少考虑的事情。我们被投入一条湍急的河流中央,固执地注视着已经离开我们的岸上的残垣断壁,同时河流继续裹挟我们前行,把我们推向一个未知的深渊。

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在法国一样,我正在描述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做出了这样迅速的进展。但它总是在偶然之中被人们所接受。国家的首领们从来没有想过为它做出任何准备工作。在他们的抵抗中,在他们不知不觉之时,它就已经获得了胜利。国家中最有权力的、最有知识的和最有道德的阶级从来没有试图把自己同它联系起来,以便引导它。因此,民主被放纵于它的粗鲁本能,而且它像那些弃儿一样长大成人,在街头接受教育,除了社会的罪恶与痛苦之外不晓世事。在它突然攫取最高权力之时,人们对于它的存在似乎还是一无所知。人们驯顺地迎合它的最小的愿望,它被作为实力的象征受到崇拜,直到当它自己因行为过激而受到削弱之时,立法者才想出鲁莽的方案去消灭它,而不是教导它并纠正它的有害倾向。不是努力使它学会统治,唯一的想法是把它从政府中驱逐出去。

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主革命仅仅在社会的物质层面上实现了,而没有在法律、思想、习俗和风尚中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做法对于产生这样一场革命的有益性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了民主,但苦于不能减轻它的罪恶并使它的天然优势更为突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它产生的罪恶,但却无知于它可能带来的好处。〔1〕

接着,在下文中,德·托克维尔先生生动地描绘了已经逝去但不能再回归的社会状态,还描绘了更为快乐,但就他而言不太辉煌的,却是我们现在应该热望的社会状态。尽管民主带走了我们应该热望的这种良善的社会状态,但如果民主的天然能力得到了改良,它还是可以产生这种状态的。

当王权在贵族的支持下和平地统治着欧洲诸国时,社会在不幸之中还拥有我们时代难以领悟与想象的几种优势。

某些臣民的权力为王室的专断树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君主

---

〔1〕 Reeve, Vol. I, pp. xxii—xxiv; Tocqueville, Vol. I, pp. 10—12.



认为,在群众的眼中他享有几乎超凡的人格,从自己造就的敬意中获得公正地使用权力的动机。

贵族尽管高高在上于人民,但就像牧人对待羊群一样,平静而和善地关注人民的利益。他们不承认穷人和自己平等,却关照穷人的命运,将此作为上帝赋予的责任。

人民从来不会想到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状态(state of society),不会怀有成为自己首领的竞争者的期望。他们接受首领的恩惠,而不怀疑首领的权利。当首领仁慈和公正时,他们依恋着他。他们也顺从地或不卑不亢地接受他的压迫,视之为不可避免的上帝之手的惩罚。然而,行为习惯也在暴力行使中产生了某种法则,为压迫确立了某种限度。

由于贵族从来不会怀疑有人会试图夺取他自信合法的特权,也由于农奴把自己的卑下看做是必然的自然秩序的结果,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在命运如此不同惠顾的两个阶级间将会出现一种相互的友善。那时,可以在社会中发现不平等与苦难,但任一等级的心灵都没有堕落。

人们变坏不是由于行使了权力或养成了服从的习惯;而是由于他们认为行使了非法的权力,或服从了他们看做是篡夺的和不正当的统治。

一方是财富、力量和闲暇,伴随着奢华的享受,高雅的品位,知识的愉悦,和艺术的素养。另一方是辛劳、粗野和无知。但是在这些粗野和无知的群众中,常常会遇到充沛的激情、慷慨的情操、强烈的宗教信仰和质朴的美德。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拥有稳定、力量,首先是光荣。

但是现在,背景改换了,两个等级逐渐混合起来,曾经分离人类的障碍降低了,财产被分散了,权力被分割了,智慧之光扩展了,所有阶级的能力都同样得到了提高。社会状态民主起来,民主的统治被慢慢地、平静地引入到制度与风俗中。

现在,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由于所有人都认为法律来源于自己,会把自己的热爱与顺从给予法律。在其中,国家